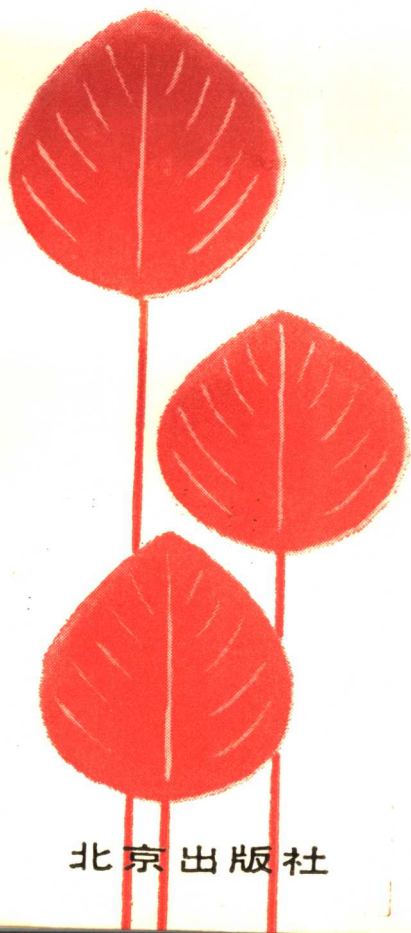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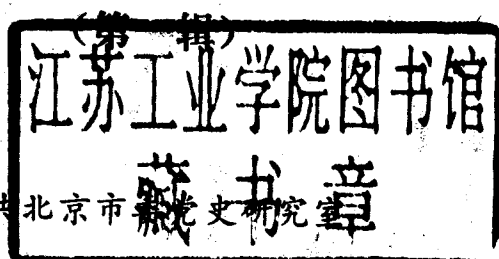
第一辑

北京革命史回忆录



北京出版社

北京革命史回忆录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革命史回忆录

(第一辑)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北京仰山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875印张 353,000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000

ISBN 7-200-01504-0/K·133

定价：5.80元

前 言

北京革命史，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北京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最重要的传播阵地之一，也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国现代革命史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抗日战争、北平和平解放等等都发生在北京。因此，北京革命史料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种类多、数量大、内容极其丰富。

为了保存史料，向学习和研究北京党史、北京革命史、中共党史、中国现代革命史的读者提供资料，教育后人，我们将陆续编辑出版一套《北京革命史回忆录》。共分为四辑，约150万字左右。第一辑为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19年5月—1927年7月）；第二辑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7月—1937年7月）；第三辑为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1945年8月）；第四辑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5年8月—1949年9月）。

本辑为第一辑，共收入52篇回忆文章，其中有些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文章作者都是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他们以个人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从不同侧面或片断追忆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京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内容广泛、具体，涉及到“五四”运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第一——三次代表大会、“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北方区委、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三一八”惨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重大历史事件；文字生

动活泼，事件、人物、情节叙述细腻，栩栩如生，读后犹如身临其境，感染力强。尽管由于事隔多年、囿于记忆，难免出现一些人名、地名、年月日、具体情节上的不一致、差错或不完全精确有待订正，但并不影响对历史本质的反映。由于这些文章是来自历史事件当事人的第一手史料，记述了一些文献资料上所没有甚至不可能有的历史内幕，可作为对文献资料的补充。因而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它是党史工作者、高等院校和宣传教育部门研究北京党史、北京现代革命史、中共党史、中国现代革命史的重要史料，也是对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在编辑过程中，基本上保持了原文全貌，个别进行了节录。文章编排以历史事件发生时间先后为序，按专题集中。个别文字改动、错字订正，均以编者注释说明。漏字以□号标明。作者回忆时间和原文出处，在篇后（ ）内标明。凡未收入本辑的该时期的北京革命史回忆录书目，统一附录在第四辑后面。参加本辑选编工作的有赵秀德、殷丽欣、马春玲、谢诚。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1991年1月13日

目 录

回忆“五四”运动、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	
党的“一大”	刘仁静(1)
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	李葆华(5)
李大钊永远和我们一起	肖 三(15)
回忆李大钊	包惠僧(20)
于树德的回忆	(27)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罗章龙(31)
回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朱务善(40)
星火燎原——回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朱务善(44)
我的回忆(节录)	张国焘(52)
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	张申府(62)
回忆党的创立时期的几个问题(节录)	罗章龙(68)
中共成立前后在北京工作的回忆	朱务善(78)
访问刘亦宇谈话记录(摘录)	(96)
回忆建党初期党领导北方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	刘清扬(102)
我们的园地——沙滩	包惠僧(124)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前后的回忆	栖梧老人(126)
记北劳劳动组合书记部	罗章龙(141)
1922年入团后的一些回忆	楚图南(159)
回忆“二七”大罢工	罗章龙(161)
忆京绥铁路车务罢工片断	杨 于(175)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节录)	邓中夏(179)
我所了解的北京和北方区党组织的一些情况	彭健华(185)
对彭健华同志回忆的几点补充	王斐然(228)
关于早期北京党组织的片断回忆	胡曲园(231)
1926—1928年北京党组织的一些情况	吴成方(233)

1923—1926年在北京参加团的活动回忆	尹才一(240)
回忆向导周刊在北京印行的经过	刘鉴堂(245)
对《回忆向导周刊在北京印行的经过》一文的补正	彭健华(249)
回忆孙中山先生北上及北京民国日报被查封的经过	邹明初(251)
一战时期共产党对冯玉祥的影响(节录)	陈天秩(259)
李大钊送我上黄埔军校	李运昌(272)
我奉命上西北军校	阎兴汉(277)
李大钊敦促冯玉祥回国策应北伐的经过	马文彦(279)
我在北大	千家驹(286)
清华第一个党支部的建立及其活动	王达成(316)
回忆清华党组织早期的一些活动	朱理治(320)
20年代清华地下党的一些情况	余冠英(325)
20年代我在北京参加革命活动的片断回忆	臧恺之(327)
参加北京党组织早期领导的一些活动的回忆	齐淑容(333)
在北京蒙藏学校(节录)	乌兰夫(337)
顺义县一次农民运动的片断	王斐然(359)
乐天宇同志的回忆	(364)
三·一八惨案和中共北方区委	冉廷栋(367)
三·一八惨案目击记	王养甫 谢霖(389)
三·一八惨案中的北大学生	刘生浚(399)
一场预谋的屠杀	杜文若(407)
我所经历的“三·一八”惨案	臧恺之(413)
一个请愿学生的见闻	杨春洲(417)
回忆“三·一八”惨案	李沐英(421)
关于“三·一八”前后的一点回忆	刘冀(424)
谭祖尧、吴平地烈士殉难始末	龚灿滨(427)
对赵世炎事迹的回忆	肖三(432)

回忆“五四”运动、北京马克思

主义研究会和党的“一大”

刘仁静

一、关于“五四”运动的领导问题

“五四”运动是一次自发的爱国运动。因为巴黎和会要把山东划归日本势力范围，中国学生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坚决反对。北京学生在5月3日晚上开会，情绪非常激昂，主张第二天就进行请愿，制止军阀政府签订巴黎和约。但当时并没有预料到这种行动将会引起全国规模的运动。至于4日游行的具体议程，也没有谁在事先计划过。游行队伍到东交民巷，以后又去赵家楼、火烧曹汝霖的房子、殴打章宗祥等等行动，都是游行队伍出发以后，临时决定的。

“六三”罢工，同样没有预先的计划。

陈独秀在“五四”时，无论在名义上、在实际上，都可说是运动的领导人。在运动期中，曾经发生这样一回事：北大学生被捕后，陈独秀自己写传单，托人印好后，亲自到新世界楼上散发，当场被警察拘捕。由这一事实，也可看出当时在陈的周围，还没有什么组织，如有，他一定通过组织来做，进行的方法也可以高明一些。

李守常先生是个从国民党转变为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他反对辛亥革命后国民党的军事活动，主张救国从宣传新文化入手。

“五四”时，他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反对文言文，宣传新文化。这时候，他还不擅长于实际工

作，没有到下层去组织群众。他的影响，主要在北京，对全国的运动，没有研究。李守常先生同国民杂志社、新潮社以及少年中国学会有关系，是因为李先生当时是社会上知名之士，这些团体都同新文化运动有关，所以找上李先生。这几个团体在当时还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

二、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情况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什么时候组成很难说。1918年时，没有这种组织。我是1920年冬天参加的。研究会的成员都是“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以北大學生为主，其他学校有个别进步分子参加。那时，大家正在寻找国家的出路，追求真理，对社会主义还没有明确的认识。研究会的几十个会员中，除部分相信马克思主义以外，有的相信基尔特社会主义，有的相信无政府主义。其实，在当时他们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也没有什么研究，只是从杂志上看了一些有关宣传品，认为有道理，合乎自己的胃口，以后看见别的主张更好，有的也就放弃了自己原先的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很崇拜自由，以为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纪律、妨碍自由，故退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如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陈德荣、陈友翠等，在研究会里只参加了一两次会就退出了。在他们退出研究会之前，研究会里并没有发生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争论。他们退出研究会之后，就去搞他们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了。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没有会长、干事等名称，没有章程和纲领，也没有一定的纪律。开会时，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发起者是几个北大学生，其中没有李守常先生。研究会开会，李先生也不参加，可能在背后指导。研究会开会多在北大第二院的教室，几十个人在一起，没有分组，可以说是半公开的。

研究会的活动：

1. 请人作报告（有时是研究会内部人作报告），介绍马克思

主义，这种会不定期举行。

2. 1920至1921年间，会员中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何孟雄、包惠僧等。在铁路工人中办“工人补习夜校”，这种夜校，长辛店有一个，南口也有一个。此外，同唐山的铁路工人也有联系。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里并不讨论工人运动（1922年十月革命五周年，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开会，中国代表团中有一工人代表，就是长辛店的工人，姓王）。后来，交通部在铁路工人中有特派员，通过李守常先生的社会关系，何孟雄和包惠僧也当了特派员，在工人中进行工作。

3. 指导学生联合会工作，李守常先生同学生中一些进步分子谈话以外，还给学生讲演等等。

4. 宣传工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里主要讨论如何开展宣传工作。

5. 举行过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的纪念会，会上请人作报告。研究会里，没有讨论过党纲、党章。也没有规定学习内容。

1921年时，共产国际的刊物《国际通讯》，每周三期，有英、法、德三种文字。

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其他各地马克思主义小组，除人事上有些联络外，没有工作上的指示关系。记得1921年苏联召开远东民族会议时，我曾通知上海、济南、北京3个小组，选举出席会议的代表。

1920年时，北京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没有什么外围组织。天津觉悟社可以说是它的外围组织，觉悟社是个青年的组织，同情马克思主义。周总理、邓颖超都是这个社的社员。

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1922年5月间正式成立的，以学生为主要工作对象，参加学潮。

三、第一次党代会的情况

第一次党代会的人数是12人。包惠僧不是代表。

有的历史书上说，第一次党代会上有过反对“左”、右两种倾向的斗争，胡华的书说我是“左”派的代表，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并无其事。在“一大”上，没有什么“左”、右派，也没有什么“斗争”，就我的情形说，当时还很年轻，对共产主义懂得很少，不可能形成“左”的系统，成为一“派”；另一方面，毛主席在“一大”会上，很少发言，因为他刚离开湖南，对马克思主义知道得也不多，加上他很慎重，所以大会上，并没有什么“斗争”。大会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略有争论，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动摇、不可靠，在吸收他们入党时，应特别慎重，一般不容许他们入党。

“一大”在选举中央委员时，张国焘有过一些小组活动，结果他认为应选上的人都被选上了，象李汉俊这样的人（在《星期评论》写文章，懂得马克思主义较多）却没有选上。

党内政治上的分歧，直至1923年第三次党代表会时，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才表现得比较明显。一方面是陈独秀，主张一切归国民党，国民革命应由国民党来领导，认为孙中山是天然的国民革命的领袖。另一方面，毛主席主张应该依靠工人、贫民，认为中农和富农是靠不住的，有工农联盟的思想。但毛主席在会上没有以自己的意见驳斥陈独秀的意见，会后曾同我谈起上述的主张。陈独秀的意见在会上占了统治地位。毛主席的意见同陈独秀的意见间的矛盾，有如苏联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对陈独秀的错误思想没有看得很清楚，使革命受到损失。

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荷兰人）到中国来，对中国党的建立，作用较大。他曾参加过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对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还提过意见。他曾到桂林会见了孙中山，因觉得中国共产党力量太小，主张国共合作，他的这个意见得到了第三国际的同意。国共合作开始提出时，许多共产党员思想不通，经他说服后，才得实践。（1957年4月回忆，原载《一大前后

（二）》，1980年8月，人民出版社）

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

李葆华

我在父亲身边生活的岁月并不长。但是，父亲作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坚定的革命信念，炽烈的政治热情，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刻苦学习的精神，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以及他被捕后坚贞不屈、壮烈牺牲等事迹，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长期以来鞭策、教育着我。

1918年7、8月间，我们全家离开渤海之滨的故乡——河北乐亭太黑坨村，随父亲来到北京。那时候，父亲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击败德国而宣告结束。那时古老沉寂的北京突然笼罩着一派表面的喜庆气氛。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连日免费开放，招待市民。一天，吃过晚饭以后，父亲很有兴致地带着我们一家人去中央公园，虽然已近黄昏，公园里仍然人山人海，拥挤非常。父亲带着我们来到按照克林德碑改建的“公理战胜”牌坊前，意味深长地说：“总有一天我们要把这个牌坊拆掉！”十分鲜明地反对许多知识分子把战争的终结说成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的谬论。父亲的这种远见和卓识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父亲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光辉著作。前者是他在天安门庆祝大会上的讲演稿，随后又在中央公园的庆祝大会上讲过一次。父亲在这

两篇文章中明确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20世纪新潮流的胜利。他热情地讴歌十月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新曙光，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预言，布尔什维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尽管我们当时不能真正理解父亲的见解，但他那种欢欣鼓舞的热烈情绪，还是深深地感染了我们。“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的这些话一直为后人所传诵，鼓舞着人们为真理而斗争。

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在父亲的思想发展史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父亲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来观察世界，并以此为武器，奋起向旧世界宣战，成为在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战士。

五四运动时期，父亲还发起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并在《少年中国》月刊的总编辑。这个学会在北京设总会，南京、成都及法国巴黎设有分会。在父亲的努力下，少年中国学会成为以“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以改造中国为目的的学术团体，是五四时代一个有影响的进步青年组织。1921年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父亲等人为争取确立少年中国学会的社会主义方向，多次同学会内的国家主义分子、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后来，由于会员成份太复杂和时局的激烈变化，到1925年终于分化了。少年中国学会早期的功绩是不能抹煞的，它团结了一批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其中很多是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我们党许多早期的党员，如邓中夏、黄日葵、赵世炎、高君宇、蔡和森、恽代英、张闻天、罗章龙、张申府等，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这个学会。

二

1919年夏天，我跟随父亲到昌黎五峰山去度暑假。夏季的五峰，风景如画，气候宜人，是避暑的好地方。父亲进山以后，他就投入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他随身带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每

天除了埋头读书，就是伏案挥笔疾书。只是在工作实在疲沓时，才走出祠堂休息休息。

父亲这次来五峰山，正值五四运动后不久。行前，父亲看到了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的反动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中鼓吹所谓点点滴滴改良，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都能谈的事情”，提倡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胡适的这种公开挑战，激起父亲的无比愤慨。到五峰山以后，他便写了一篇题为《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这篇战斗檄文，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父亲在这篇文章里公开宣布：“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他批驳了包括修正主义在内的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指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不应把“主义”变成纸上空谈。

三

从1922年底到1924年初，父亲经常不在北京，频繁地奔走于大江南北，为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努力工作。早在建党初期，父亲就通过林伯渠同志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党的二大、三大，正式确定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父亲受党委托，负责同孙中山先生联络，本着既联合又斗争的精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推进国民革命。由于父亲和其他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迅速发生转变，开始认识到要想革命成功，依靠少数地方军阀不成，必须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正式确定了“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同意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父亲被孙中山先生指派为这次大会的代表，并担任大会的重要领导工作。就是在这次大会上，父亲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担负北方地区国民

党的领导工作。

在促进革命统一战线事业中，父亲同孙中山先生建立了真挚的革命友谊。孙中山对中国共产党人给予他的真诚帮助非常感动，对父亲的为人也极为钦佩。父亲很敬佩孙先生，认为孙中山是个伟大的革命家。1925年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中共北方区委在北京组织了盛大的欢迎，父亲亲自前往车站迎接。此后不久，孙先生不幸病逝，父亲异常悲恸。中共北方区党委组织了大规模的隆重的追悼活动，父亲是孙先生治丧委员会成员，亲自扶灵。在开追悼会那天，《晨报》上专门刊登了父亲步出中山堂的照片。

四

1924年底，北方地区的斗争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实施，加快了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促成了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很大分化。冯玉祥的“倒戈”，以段祺瑞为首的段、张、冯3派联合政府的建立，使北京的政局变得异常复杂。

那时父亲正在苏联，他是五月里接到党中央的命令，作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大会结束后，其他代表先期回国，父亲在苏联又逗留了一个时期。他到各地参观、访问、考察和讲演，并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俄文。在苏联期间，父亲给家里来过几封信。他那时化名“李琴华”。父亲曾写信向家里要一件皮大衣，看来他是打算在苏联至少过了冬天再回国。他非常渴望在十月革命的发源地，在伟大列宁的故乡多走走，多看看。然而，他的这个计划没有能够实现。北京政变的消息使父亲再也住不下去了。11月份，遵照组织的决定，父亲怀着“回到战场上去”的战斗激情，回到了祖国。

父亲回国后不久，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共北方地区执委会，由父亲全面负责北方区委的领导工作。1924年底到1925年初，父亲和中共北方区执委在广大北方地区大力开展工作，党在工人、农民、士兵、学生等各阶层人民中间，进行着非常活跃、

卓有成效的活动，积极慎重地发展了大批党团员。我也是这个时期加入共青团的。

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北方区党委开办了第一个区委党校，利用寒假培训骨干力量。党校设在距沙滩不远的北大三院二楼的一间大教室里。学员主要是北京的党团员，也有从北方其它省市来的，学习时间约一个月。1926年春节前后，我每天到党校参加学习。党的领导同志赵世炎、陈乔年等亲自给我们讲课。他们除了讲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基本知识外，也讲国内国际形势。最后一课是由父亲讲的，讲课的主要内容，以《土地与农民》为题目，发表在1925年12月30日到1926年2月3日的《政治生活》上。后来毛泽东同志把它收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供讲习所的学员学习。

父亲很早就开始注意研究农民问题。他说：“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又说：“在乡村中作农民运动的人们，第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

“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他提出了“耕地农有”的口号。他花了很大功夫调查、统计、研究土地问题。父亲在讲课中特别强调了依靠农会和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性。

五

中共北方地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以后，对北京政变后的北方地区的斗争形势做了认真的分析。当时段祺瑞虽是临时执政，但他手中无兵，只有一个几百人的卫队，奉系军阀张作霖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政治上极端反动，军事上比较强大，是一个最危险的敌人；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公开打出反直倒曹的旗号后，还有一点同情革命的表现。他的国民军曾提出“不扰民、真爱民”的口号，

并从故宫中轰出清末皇帝溥仪，一时颇得社会上好评。北方区委分析了冯玉祥的政治态度，认为应当争取冯玉祥，特别是国民军，经过做工作之后，有可能争取它倾向革命。因此，北方区党委确定了争取国民军，打击段、张的革命策略。

父亲对争取国民军的工作十分重视，他亲自做冯玉祥及其手下的高级军官的工作。父亲还把一些同志派进国民军中去，做中、下层官兵的工作。后来，国民军各军中有不少负责工作是共产党员担任的。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前一天，群众包围段祺瑞政府，要求段政府公开表示态度，抵抗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这次行动是党组织统一布置的，我也参加了。群众来到段祺瑞的住宅前，要求段祺瑞出来。那天守门的卫兵是冯玉祥的国民军。卫兵没有开门，愤怒的群众便把住宅团团包围起来，有人还想翻墙进去抓段祺瑞，受到卫兵阻拦，因此双方发生了口角，相持了五六小时，直围到天色很晚，人群方才散去。当天晚上，总指挥韩麟符向父亲汇报当天群众运动情况。父亲听到我们同国民军的士兵发生纠葛时，即表示同国民军士兵不要搞得太僵，我们还是要争取国民军的。

党对国民军的一系列争取工作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在国民军的驻防区内，他们对共产党的活动往往采取不干预的态度。“三·一八”惨案后，冯玉祥解除了段祺瑞的卫队的武装，对段屠杀人民群众表示抗议。后来奉系军阀张作霖向北京进攻，国民军准备撤出北京时，国民军一位旅长跑到父亲住所，恳切地要求保护父亲出京，到他的部队里暂避一时。父亲坚决不肯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这位旅长只好很惋惜地走了。父亲牺牲以后，冯玉祥命令国民军全体官兵戴孝，悼念父亲。国民军同情革命的倾向，为我党发展北方地区的革命形势，创造了有利条件。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在父亲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之下，北京等地的国民党市、区各级党部陆续建立起来，并成立了国民党北方的最高领导机关。在父